

东海西岸传统海商家谱文献整理与研究

陈国灿 主编

浙东传统海商家谱研究

官凌海 郑微微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优势学科重大项目
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

东海西岸传统海商家谱文献整理与研究

陈国灿 主编

浙东传统海商家谱研究

宫凌海 郑微微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是在对古代浙东地区海商家谱系统调查、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弄清该地区海商家谱的历史发展、流传过程和存世情况,总结其地方特色,分析海商家谱与地方海洋文化的关系。主要分两部分:一是对有关海商家谱的考证、介绍和分析,探讨海商家谱的文献价值;二是围绕海商家谱和海商家族的相关问题作专题研究和讨论,通过海商家谱透视浙东海洋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特点。

本书适用于家谱相关研究学者、政府有关部门、大学生和社会较高文化层次读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东传统海商家谱研究/宫凌海,郑微微编著. —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313-20859-0

I. ①浙… II. ①宫… ②郑… III. ①企业家—家谱
—研究—浙江—古代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7085号

浙东传统海商家谱研究

著 者:宫凌海 郑微微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印 制: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mm 1/16

字 数:314千字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20859-0/K

定 价:128.00元

地 址:上海番禺路951号

电 话:210-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22.5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10-84720900



陈国灿 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城市史、江南区域史、中国海洋历史与文化研究。先后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出版各类著作20余部，刊发论文100多篇。研究成果获浙江省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20多种奖项。



宫凌海 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博士后，现为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海洋历史与文化研究，出版有关著作1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郑微微 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海洋历史地理研究，出版著作数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总 论

东海西岸传统海商家谱与海洋文化

陈国灿

海商家谱是传统涉海文献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其内容除了海商及其家族的活动情况，还涉及不同历史时期海洋经济和社会的有关信息，反映了传统海洋文化的丰富内涵，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海陆交汇环境下沿海社会的演进轨迹与历史特点。位于东海西岸的浙江、福建、苏南和上海等地是我国海洋文明源起和发展的重要区域，海商群体历来相当活跃，不仅规模庞大，影响广泛，而且宗族组织发达，谱牒编修风气盛行。透过为数众多的海商家谱，不仅可以深入和分析传统海商的活动形态，也有助于准确认识和把握该区域海洋文化的历史传统与地方特征。

一

历史上，海商是随着海洋贸易的兴起而出现的。在东海西岸地区，海上贸易活动早在汉代就已起步。《后汉书》在介绍东南海外“夷人”的情况时提道：

会稽海外有东鯤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儋洲……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儋洲者。^①

显然，至迟到东汉时期，地处东南沿海的会稽郡已与海外“夷人”发生贸易关系。当时在会稽郡沿海地区开始形成诸如钱唐、句章、鄞、章安等一批较具形态的港口城市，^②由此吸引了一定数量的海商。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年），富春人孙坚“与其父共载船至钱唐，会海贼胡玉等从匏里上掠取贾人财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进”。^③可见当时钱唐的港口贸易已有一定规模，聚集了不少商人，以至引起海盗的垂涎。

进入六朝时期，随着持续大规模的地域开发，东海西岸地区的社会经济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作为六朝王畿腹地的“三吴”（吴郡、吴兴郡、会稽郡）一带，更是初显繁荣。与此相联系，海上贸易也有较汉代有进一步发展。西晋人陆云在谈到会稽郡东部鄞县的海上贸易情况时，赞叹地说：

鄞县……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汎船长驱，一举千里。北接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④

① 范晔：《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22页。

② 钱唐原隶会稽郡，东汉中期改隶由会稽郡分置的吴郡，唐初为避国号讳，改称“钱塘”，今属浙江杭州市。句章、鄞县位于会稽郡东部沿海，今属浙江宁波市。章安在会稽郡东南沿海，今属浙江台州市。

③ 陈寿：《三国志》卷四六《孙破虏讨逆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93页。

④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一〇三，陆云《答车茂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049页。

不过,整体而言,隋唐以前东海西岸地区的海洋贸易尚处于较低水平,且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海商数量也比较有限,群体规模不大。迨中唐以降,这种状况开始发生明显变化。随着中外交流重心由西北转向东南,由陆路走向海洋,东海西岸地区成为对外贸易的核心区域,贸易对象包括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和南亚、西亚乃至北非等地。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考察了菲律宾、印度、伊朗、埃及等国出土的中国唐代陶瓷后说:

逐渐增加的对海上贸易的大量需求,在9至10世纪左右迸发了出来。从阿拉伯、印度方面一只又一只大船开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等地,购得货物后又西行回国,中国方面的巨船也驶向南海大洋。^①

据有关学者统计,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到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中日之间的商船和人员往来见于史载的有52次,大部分是经由浙东明州等口岸进出的。^②其中,在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至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的60余年时间里,唐朝海商赴日贸易的次数仅见于史载的就有36次。^③这些海商出海贸易大多结队而行,具有一定规模。据日本文献记载,仁明天皇承和十四年(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以张友信为首的唐商团队有47人;^④清和天皇贞观四年(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八年(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

① (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等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

② (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24页。

③ 武安隆:《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175页。

④ (日)藤原良房等:《续日本后纪》卷一七,承和十四年七月,日本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本,吉川弘文馆1979年版。

十六年（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十八年（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先后抵日的唐商团队有李延孝等43人、张言等41人、崔发等36人、杨清等31人；^① 阳成天皇元庆元年（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以崔铎为首的唐商团队有63人，他们于6月1日从浙东台州临海港出发，7月25日到日本的筑前港，^② 这在当时算得上一支大规模的海商团队了。

两宋时期，东海西岸的区域社会经济在长期开发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走向繁荣，商品生产和流通空前活跃，经商逐利风气聿盛。时人感叹地说：“今世积居润屋者，所不足非财也，而方命其子若孙倚市门，坐贾区，颛取仰给，争锥刀之利，以滋贮储。”^③ 海外贸易利润丰厚，“每十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④ 由是吸引人们纷纷参与其中，出海逐利之风聿盛。与此同时，宋政府认识到民间海外贸易可以带来可观的市舶收入，有助于缓解财政困难的局面，故采取积极支持和鼓励的政策。宋高宗曾公开对臣下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⑤ 这些因素的结合，加上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推动东海西岸地区的海洋贸易呈现出空前的兴盛，海商群体不断壮大。史称：“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⑥ 据朝鲜文献《高丽史》

① （日）源能有等：《日本三代实录》卷六，贞观四年七月；卷一三，贞观八年十月；卷二六，贞观十六年七月；卷二九，贞观十八年八月，日本醍醐天皇延喜元年（901）本。

② （日）《日本三代实录》卷三一，元庆元年八月。

③ 范浚：《香溪集》卷二二《张府君墓志铭》，《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本。

④ 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民国宋人集本，上海书店1994年影印。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六，绍兴七年闰十月辛酉，中华书局1988年版，1686页。

⑥ 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

记载,从高丽显宗三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到高丽忠烈王四年(宋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年),仅前往高丽贸易的宋商船队先后就有130批次,其中确知人数的87批次,合计达4955人。^①另据有关学者考证,北宋时期先后由明州等口岸赴日本的宋朝海商船队可以判明的就有70多次,实际次数显然较此要多得多。^②到南宋时期,由于日本放松对海外贸易的限制,宋商赴日更为活跃。为数众多的海商不仅频繁往来于宋日之间,不少人还长期寓居日本。日本博多的“宋人百堂”,便是11世纪末以降在宋商汇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华侨居留区。参与海洋贸易活动的人员,既有豪商富室,如南宋时都城临安的富室“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③也有各级官员,如南宋初大将张俊遣手下老卒出海贸易,“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④还有贵族宗亲,如宋高宗绍兴(1131—1162)末年,鉴于当时泉州南外宗正司的不少宗族人员参与海外贸易,凭借特权横行不法,宋廷不得不下令禁止:“两宗司今后兴贩蕃舶,并有断罪论。”^⑤不少沿海农户、渔民,甚至部分宗教人员也加入其中。如福建路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沿海居民转而从事海上贸易的现象颇为常见。“漳、泉、福、兴化滨海之民……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⑥杭州僧人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牟利”。^⑦在为数众多的海商群体中,有的资

① 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279页。

② 王勇、郭方平等:《南宋临安对外交流》,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③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八《恤贫济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④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老卒回易》,明刻本。

⑤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四之四三,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

⑥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七。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五,元祐四年十一月,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493页。

本厚实，经营规模庞大。如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货二万万”；^①另一海商王仲圭拥有众多海舶，一次出海贸易就能“差拨海船百艘”。^②有的因资本有限，无力独自出海，只能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转相结托，以买番货而归”；^③或者依附大海商出海贸易，租赁海舶舱位，“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④

进入元代，东海西岸地区的海上贸易更为兴盛，海商群体也愈显活跃。如福州海商众多，“有不少印度船舶来此，亦有商人赴印度诸岛贸易”；^⑤泉州是最重要的贸易口岸，许多海商从事远洋贸易，“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阇婆、罗斛，与凡东南诸夷，去中国亡虑数十万里”。^⑥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不少富称一方、颇具社会影响的海商家族。如嘉定州大场镇的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太仓朱清、张瑄两族均拥有规模庞大的船队，既参与官方漕粮海运，又从事海外贸易，“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由此获得很高的政治地位，“父子致位宰相，第侄甥婿皆大官”。^⑦嘉兴路澈浦镇的杨氏家族，从杨发、杨梓到杨枢，三代从事海外贸易，在当地称雄数十年，引发“小民争相慕效”，习以成风。^⑧庆元路鄞州区人夏荣达移居定海，从事海外贸易，数年间便成为当地首富，“泉余于库，粟余于廩，而定海之言

① 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六《泉州杨客》，中华书局1981版，第588页。

②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之二三。

③ 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

④ 朱或：《萍洲可谈》卷二，《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六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⑤ 《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

⑥ 王彝：《王常宗集》续补遗《泉州两义士传》，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⑦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七、卷五，《四部丛刊三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⑧ 清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三《方域篇》，《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8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

富室者归夏氏”。^①

明清两代，虽然官方在大部分时间里推行海禁政策，但东海西岸地区的民间海上贸易活动并没有停止，某种意义上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明人沈鈇说：“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力，比比然也”。^② 清人谢章铤也说：“闽地饶薄，无生产，人多农少，资于田者二，资于山者三，资于海者二，资于商贾者四。”^③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着不同特点的海商集团。他们有的是利用政治特权的官商。如明万历（1573—1619）年间，福建税监高案“造双桅二巨舰，诳称航粤，其实意在通倭，上竖黄旗，兵士不得诘问”。^④ 泉州南安郑氏家族自郑芝农接受朝廷招安后，一度成为南海贸易的龙头。“独有南海之利，商船出入各国者，得芝农符令乃行”；^⑤ “凡中国各货，海外人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⑥ 有的是武装走私的所谓“盗商”。如明成祖永乐（1403—1412）年间，福建地方官员奏称，当地濒海居民“私载海舡，交通外国，因而为寇”。^⑦ 当然，更多的属于地域性的民间商人集团。明人郭春震《备倭论》云：“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⑧

①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三《玄逸处士夏君墓志铭》，《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② 沈鈇：《上南抚台暨巡海公祖请建澎湖城堡置将屯兵永为重镇书》，《大清一统志·台湾府志》附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编印。

③ 谢章铤：《谢章铤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④ 张燮：《东西洋考》卷八，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8页。

⑤ 邵廷采：《东南纪事》卷一一《郑芝农传》，邵武徐氏刻本。

⑥ 郁永河：《郑氏逸事》（不分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

⑦ 《明太宗实录》卷二七，永乐二年正月，（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年编印。

⑧ 清乾隆《潮州府志》卷四〇《艺文》，（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版。

二

东海西岸地区海商群体的兴起与发展，与宗族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海商社会的组织形态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以家族纽带为组织特征。前面提到宋元以降海商家族的大量涌现，便反映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对于家族活动和相关事务，海商大多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尤其是家族谱牒的编修，更是海商普遍关注的重点。

在传统社会，修谱是家族的大事。通过家族谱牒的编修活动，可以强化祖先认同和血缘关系，维系宗族内部的等级与秩序，凝聚族人的向心力。不过，对于许多家族来说，修谱无疑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工程，不仅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更需要有坚实的财力支持。因此，捐资修谱成为东南海商参与和支持家族事务最常见的方式。在福建泉州地区留存下来的诸多海商家谱中，便记录了这方面的大量具体事例。如《桃源前溪周氏族谱》载，该族十八世周贻芳赴南洋马六甲经商，对家族活动和家乡公益一直十分热心，“乡中办学、修谱及其他公益事业，皆慨捐巨资助成”。十九世周维恩“少年营商业于南洋”，“适逢家族修谱，并董其事，对于经费皆竭力筹措，以底于成”。《社坛叶氏族谱》也一再提到，该族历次家谱编修多赖族中海商鼎力资助。其中，叶家声“为人素有干济之才，名震异邦，捐贖修谱”；叶嘉肴经商菲岛，颇为成功，会族中修谱，遂“赞助二百金，乡人皆赞美为明于大义”；叶良脐年少时就外出赴菲律宾等地经商，“于公益

事赞助甚力，此次恤房重修谱，君出二百金，可为事实之证明”。^①浙东地区的传统海商家族也有类似例子。如镇海虹桥朱氏二十一世朱忠煜年少即参与海洋贸易活动，“廿六岁即经理瑞茂税行，并代木商筹办航行护勇，而函牍字算均极精熟，不假手于人”。^②他看到本族自清乾隆年间首次纂修宗谱后，曾数次欲重修和续修，均因经费不足而未果，遂捐资出力，亲自组织完成《镇海虹桥朱氏重修族谱》的编修。谱首朱忠煜《新序》云：

族之有祠，钜工也，有谱而待修，于数十百年后又任之，至艰也。昔者吾先君子皆有志于斯，卒以经费支绌而不果。……邀宗房耆柱四十余人，公同集议，众皆踊跃称善，各视其力输费。……先从事祠宇，次及于谱，顾谱与祠系族人之多业商，与鸠工庀材诸擘画犹为之，而谱则托诸文字，非熟谙体例而又秉笔至公之人无以审是非而定去取。乃延崇邱谢彤黼孝廉主谱政，而以协修之任属之同里王明铨上舍，其采访之役则忠煜与族人共任之。祠成之明年，谱亦次第蒇事。^③

温州乐清芙蓉俞氏素有从事沿海贸易的传统，晚清时，该族俞真戊经营商贸颇为成功，“善治生产而家计颇饶”。他十分重视家族事务，积极参与修祠堂、编族谱之类的活动。该族宗谱介绍说：

公讳真戊，字德正，号刚中。……俞氏自元明以来，历世孔久，

① 庄为玑、郑山玉：《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第204—220页，下册第826—846页。

② 《镇海朱氏运石浦支谱》，“家乘琐言”，民国刊本。

③ 《镇海虹桥朱氏重修族谱》卷首“新序”，清宣统刊本。

而房祖亨一公之小宗未立，殊于报本之礼有缺。公议倡建，商之于众，皆有难色。公乃以一身任之，多方经纪，历久而祠以成。又以族谱年久失修，特命侄往欽修葺，以免散佚。^①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说海洋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成为沿海家族文化事业兴盛的重要影响因素，那么海商的大力支持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推动东南沿海地区家谱编修之风长盛不衰的直接经济基础。

东海西岸地区的海商家族大多有族人侨居海外，通过修谱以加强与海外族人的联系是不少海商家族活动的一个特色。这方面的联络工作，成为海商参与家族事务的又一项重要活动。仍以泉州地区为例，《龙浔凤池黄氏族谱》载：

荣华君当壮年之时，南渡营业，大有进益，由是与堂叔兄弟合建西金堂一座。此次修谱尤捐貲辅助，兼在洋劝募族人款项，以全美事，实大有裨益者也。^②

《丰溪蓝园陈氏族谱》载，该族陈荣明“往夷服贾，为唐人领袖”，他不仅自己捐资修祖宇，编家谱，而且积极联络海外族人，共襄盛举。族谱编修者回忆说：

予因修谱事到啞地，至其室礼貌有加。且其时啞地一带，初经祝融回禄，店务极繁，予邀同德诸劝捐，即慷慨不辞；复自己倡捐，以

① 《芙蓉西岙俞氏族谱》卷五《列传·刚中公传》，民国刊本。

② 庄为玑、郑山玉：《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上册第400—402页。

火灾委托，时能整躬率物者也。所到劝捐，人皆听其酌裁。^①

通过海商和海外华商的居中联络，在海外募集资金才能取得成功，有鉴于此，海商家谱中花费大量笔墨记录海商在家族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进一步来看，海商以各种形式参与家谱的编修，不仅基于根深蒂固的宗族血缘观念和深厚的乡土情结，亦有着现实利益的驱动。以修谱为契机，增进族人之间的联系，借此加强宗亲成员在商贸经营、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相互协作与关照，共同维护和发展以宗亲组织为基础的商业网络与经营体系，这在传统海上贸易竞争激烈、海难事故多发的环境下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部分保存下来的民间海上贸易文书也清晰地表明，东南沿海各地海商家族成员在贸易活动中大多有着密切的沟通和协作关系，他们或互通市场行情，或合作经营业务。^②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环中国海广袤的海域中，海内外家族成员之间保持密切联系，借此建立起具有家族性和传统性的商业网络。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的商业网络，为海内外家族商人的商业经营提供了便利的舞台。^③

三

东海西岸地区的传统海商家谱，虽然具体形式不一，内容也是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连篇累牍地记载和介绍本族

① 庄为玘、郑山玉：《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下册第999—1005页。

② 林玉茹、刘序枫：《鹿港郊商许志湖家与大陆的贸易文书 1895—1897》，（台）“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刊，2006年。

③ 龙登高：《海外华商经营模式的社会学剖析》，《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海商的事迹与活动。有的引以自豪地赞叹他们在海洋贸易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有的不厌其烦褒扬他们对家族和地方的卓越贡献，其中固然有夸耀和推誉的成分，却也透露出海商作为海洋社会群体的活动方式与内在特征。

从历史的角度讲，传统海商群体既是主导海洋经济的重要力量，也是沿海社会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一方面，海商活动所带来的不仅是海洋贸易的兴盛，也影响到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形态与特点；另一方面，海商对家族和乡土事务的积极参与，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沿海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演进方向。有学者指出，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进步，私人海上贸易迅速发展。在外来海洋势力的冲击和吸引下，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组织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① 其实，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东海西岸地区有着悠久的海洋贸易传统，海商活动亦早已存在。进入宋元时代，海商群体发展为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由他们引领的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也初步成型。到明清两代，各种海商集团显得更为活跃，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冲破官方倡导的地缘社会组织体系。这方面，各种海商家谱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具体的实证，从中可以看出传统海商群体活动形态和社会关系的基本性质与特点。

首先，传统海商群体的组织活动有着很强的宗族特性，他们大多依托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力量，通过父子、叔侄、兄弟相互牵引等方式，开展各种经营，以此构建各自的贸易体系。泉州莆楼林氏林崇德以出洋经商起家，“导吾叔父与吾叔功伯父功兄渐次以进，共营商业，公私有所不计，惟冀生意之日隆”；聚居永春的桃源周氏周高辉，“壮年南渡，营业得厚资，与乃兄公助开张万振兴号商店，合力

① 杨国桢：《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经营，生理蒸蒸日上，启子侄辈商战之基”；南安芙蓉李氏十六世李惟馨往南洋吕宋经商起家后，“令兄弟侄营建大厦，遗下吕宋基业，子侄辈承其利者，遂大开拓”。^① 海商依靠家族力量开展经济活动，从而使家庭或家族成为海商社会组织的核心单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家族各自的贸易活动空间和经营活动范围。

其次，传统海商群体的组织活动又有着鲜明的地域特性，地缘关系成为他们从事各种商贸活动的重要联系纽带。明清时期，东海西岸各地相兴起的各种商帮，就是以特定地域为中心形成的商人群体组织形态，带有明显的地缘文化特色。诸如宁波商帮、福建商帮等，都有着深厚的海洋贸易传统。特别是福建商帮，其构成以海商为主体，曾长期执掌着东亚、东南亚各国海上贸易的牛耳。^② 据泰益号文书，福建金门籍陈国梁及子陈世望，出身于“累代经营贸易”的商贸世家。清咸丰十一年（1861），陈国梁与七名福建同乡合资建立泰昌号，从事中日海上贸易。值得注意的是，泰昌号创建之初，尚无以交易商号登录的交易对象，但已登录了160名交易者的名字，其中大多数为其福建同乡。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陈国梁脱离泰昌号，独资创立泰益号商行，并把业务交给其子陈世望。泰益号不仅继承了泰昌号部分客户，还将业务扩展到上海、厦门等口岸城市以及台湾、东南亚。泰益商号基本的客户都是陈世望的宗亲或乡亲经营的商号，即使与泰益号仅保持短暂贸易关系且其贸易额甚小的客户，也都是经过陈世望的宗亲或同乡介绍，才得以与泰益号商行发生交易关系。^③ 家

① 庄为玘、郑山玉：《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上册第15、214页，下册第976页。

② 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③ 戴一峰：《旅日华商“泰益号”经营网络结构剖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